

高罗佩与公案小说的复兴(上)

□张凌

晚清时期,西方侦探小说传入中国,并迅速受到大众的欢迎,因其对科学和理性的推崇、对司法公正和人权的重视,得到了新派知识分子的赞赏,中国原有的公案小说则逐渐走向衰微。然而几十年之后,这一被扬弃的传统不但重又焕发出光彩,而且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性影响,唯一功臣正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先生。

高罗佩(1910–1967)本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Robert Hans van Gulik),既是职业外交官,又是学者与作家,通晓17种欧亚语言,工书法,善鼓琴,才华横溢,学贯中西,曾被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誉为“精研汉学,好古敏求,多才多艺,博雅士也。”他参照传统公案小说,创作出一系列以中国古代为背景的狄公案侦探小说(Judge Dee Mysteries),其中既有惊险曲折的探案故事,亦有关于中国社会制度、人情伦理、庙堂江湖以及琴棋书画等方面的生动描述,大唐名相狄仁杰也因此走向世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1948年,高罗佩在日本工作时,看到图书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关于纽约和芝加哥的三流侦探小说,心中很是不平,于是决定出版自己的译作《狄公案》(Dee Goong An),以向世人展示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中有很多优秀题材,并鼓励中日小说家利用中国古典素材进行类似的创作。

《武则天四大奇案》又名《狄公案》,由清代无名氏所著,前30回讲述狄仁杰任山东昌平县令时智断三桩疑案的故事,后34回则是描写他人京拜相后与武后党羽斗智斗勇、整肃朝纲的经历。高罗佩截取了前30回译成英文,命名为《狄公案》。这一英译本严格遵循中文原作的章回体形式,用一组对句作为章节回目,开篇处有一首训喻诗和一段引起正文的短故事(又称楔子),在体例上基本保留了传统公案小说的特色。

高罗佩在对比过东西方探案文学之后,认为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使得西方读者难以接受:

第一,在小说的开篇处,通常会正式介绍罪犯,包括其姓名、来历以及作案的动机。如此一来,侦探小说中最吸引读者的悬念便无法产生。

第二,中国人对于超自然现象具有天生的热爱。书中随处可见妖魔鬼怪出场亮相,动物与厨具能在公堂上开口作证,各位判官偶尔也会去阴曹地府里查看阎罗王的生死簿。这一点显然与“侦探小说应尽量保持真实”的原则有所抵触。

第三,中国人对于细节深有兴趣,公案小说中时常夹杂有长篇诗文,或是与主题无关的哲学讨论,因此常常是超过100章的鸿篇巨制,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不免过于冗长,令人望而却步。

第四,中国读者对于人名具有异乎寻常的记忆力,喜欢书中人物众多,以至于在一本小说中常常会超过二百人,而西方侦探小说通常只有十二三个主要角色,因此人物过多也是西方读者将要面对的一大障碍。

第五,在小说结尾处,中国读者期望看到关于罪犯被处决的真实描述,包括所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有时还包括罪犯在被处决之后、如何在阴曹地府里继续受到惩罚的描述。如此结局会令中国人的正义感得到满足,但是西方读者对此兴趣不大。

综合以上五点,高罗佩表明自己之所以选择将《武则天四大奇案》前30回译介到西方,正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同类作品而言,此书更接近西方侦探小说,没有在开篇处透露罪犯的身份,没有过多离奇的超自然因素,人物数量有限,没有包含与情节无密切关联的内容。除此之外,书中的情节非常有独创性,写得也很精彩,甚至符合现代西方准则,接近侦探小说中的烧脑力作。“此书介绍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就我所知,以前还未在西方流行罪案小说中运用过,即侦探同时勘察三桩彼此独立的不同案子,每一桩都有各自的背景和人物。”

虽然《武则天四大奇案》具备上述优点,高罗佩在翻译时仍做了局部改动,目的在于为西方读者进一步减少阅读障碍。比如他删去了与主线情节无关的一些人物,在正文前加入人物表,还删去了与探案无关的一部分细节,包括每一回末尾处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23

我们读书的眼光有高有低,听音乐的层次有高有低,看电影的品位有高有低,可是,我们从中得到的愉悦,并没有什么分别。

424

作为文艺欣赏,关于诗,关于画,关于音乐,有时偏见也是可爱的。

因为有热情,就必有挚爱,有挚爱,就必有偏见。而毫无偏见的文艺欣赏,恐怕又嫌平淡如水了。所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也是这个道理。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七六



新书快递

风景画家的片段人生

[阿根廷]塞萨尔·艾拉著 王纯麟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包含两部中篇小说:《我如何成为修女》和《风景画家的片段人生》。这两部中篇题材迥然不同,但都被公认为是艾拉的巅峰之作。前者以童年视角呈现成人世界的癫狂和残暴,而女童作为主人公,居然以游戏的态度勾引成人发生暴力行径,并毫不示弱地成为被残杀的对象;后者完全进入了现实与虚构的分界线,叙述随时可以出入,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漫游过程中,身为主角的风景画家完全让自己成了自然的宠儿。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美]丘成桐、史蒂夫·纳迪斯著 夏木清译 译林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丘成桐从一个中国乡村的贫穷少年成长为一名举世闻名的顶级数学家的励志故事。因顿清苦的童年,艰苦卓绝的异国求学路,初入数学界的一鸣惊人,名声大噪后的风起云涌,对中国基础科学建设的拳拳之心……攀登科学高峰,拨开浮华迷雾,丘成桐直面盛誉、无惧挑战,讲述触动人心的传奇人生。

对于历史的世界,我们应尽量避免主观,但对于艺术的世界,我们不必刻意追求客观。

425

权力的执行,必然是少数人的事情,区别只在于,大多数人能否监督、约束这些权力;文化的创造,必然是少数人的事情,区别只在于,大多数人能否欣赏、传播这些文化。

426

透过深刻的体裁(哲学)来呈现深刻,相对来说是容易的;透过浅显的体裁(文学)来

反读书记(一四七)

□胡文辉

呈现深刻,是更为困难的,也是更为可贵的——比如帕斯卡、尼采的札记,叔本华、加缪的散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奥威尔的小说。

427

也许,正因为具体的、物质的俄罗斯是如此坚硬、如此残酷,抽象的、精神的俄罗斯才会如此柔软、如此忧郁吧。泪与爱,是对铁与血的文化补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拉赫玛尼诺夫的感伤,代表了这个形而上的俄罗斯。

我热爱的正是这个俄罗斯,仅仅是这个俄罗斯。

灯下读钱

杨季康暂离清华

□钱之俊

就在钱锺书与杨季康(杨绛)的恋情逐渐升温之际,杨季康的大学本科生涯就到头了。

在清华这最后一个学期,杨季康自称“玩清头”,既选了蒋廷黻的《西洋政治史》、浦薛凤的《政治经济史》、史禄国的《人类学》、朱自清的《散文》等主选科目,还选了温源宁的《英国浪漫诗人》。她学的主要还是政治学专业,西洋文学基础并不好。所以温源宁课的一次测试她交了白卷。

晚年杨季康自称“到了清华,才用功听课,不再懒散散。”“在清华借读这半年功课忙、作业多,又碰上许多意想不到的事,自觉有点giddy(晕晕乎乎)。”(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这几个月,与其说学到了什么知识,不如说她收获了钱锺书。所以她母亲常取笑她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1932年7月,杨季康在清华完成大四的最后一学期学业,领到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毕业证,并荣获金钥匙奖。她对未上清华本科仍耿耿于怀,“我生平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清华本科。家人和亲友郑重其事为我选大学,恰恰选了一所对我不适合的大学。我屡想转清华,终究不成,命也夫!”(《听杨绛谈往事》)

杨季康毕业后,钱锺书不让她离京,让她暑期留清华补习外语系功课,好投考当年清华研究院。钱锺书指望她考入后,可与她再同学一年。可钱锺书自己暑假居然回无锡了,留下杨季康。杨季康很难受,难受了很长时间。冷静下来,她自己也觉得这是“fall in love”了。“认识才短短几个月,岂不太造次呢?”(《听杨绛谈往事》)暑期,杨季康与袁震同屋,蒋恩铨等已经回家了。袁震对钱锺书印象不好,利用和杨同屋的时机,天天在她面前吹冷风,说钱不好,什么长相不佳,狂妄自大等等。

钱锺书当然蒙在鼓里,哪里知道恋人内心起了波澜。他还写信给她,要求订婚。杨季康回信直接拒绝了。虽然她不觉得钱锺书像他们说的那么糟,不过她没有钱锺书急切,还不想结婚。

杨季康暑期补习时才发现,清华本科四年的功课,一个暑假根本补不了,只有补上了再投考,所以只好回苏州先就业。由亲戚介绍,她在上海工部局华德路小学当小学教师,人称“金饭碗”。她以为当小学教师,有时间补习外国文学,就来到上海上班。谁知道,没上几个月,因为得荨麻疹,她父母让她把“金饭碗”给了一个亲戚,她留家养病。

钱锺书想杨季康当年就报考清华研究院的,因为这件事,他们闹了别扭,杨季康冷了他一段时间,几乎要闹分手。钱锺书以为杨季康从此不理他,大为伤心,写了许多伤心诗。蒋恩铨知道钱锺书伤心,劝钱锺书继续写信。钱锺书的信写得很诚恳,打动了杨季康。最后,他们又恢复通信,复归于好。

杨季康决定将他们的恋情告诉家里,让钱锺书亮相。1933年初,寒假期间,钱锺书特到苏州探望,杨季康第一次将其介绍和父亲杨荫杭(笔名老圃)见了面。老圃先生单独和钱锺书谈话后,评价说:“人是高明的。”(《听杨绛谈往事》)